

冯苓植是我所尊重的一位当代著名作家,是我长久的文学诤友。他在文学创作中颇具神思悟性,成果丰硕,但他在生活中却很低调淡泊。有人曾通知他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士”的评选,并告诉他说奖金是20万元,而他却不解地回答:“我上午一碗面,下午一个馒头,要二十万干吗呀?”据我所知,他还遇诬不辩、与世无争,总想避开矛盾是非,实在不行了便过起云游山川或深入草原的“游牧生活”,走一个地方写一篇文章,“以文养游”,以至于文友们常常不知他的行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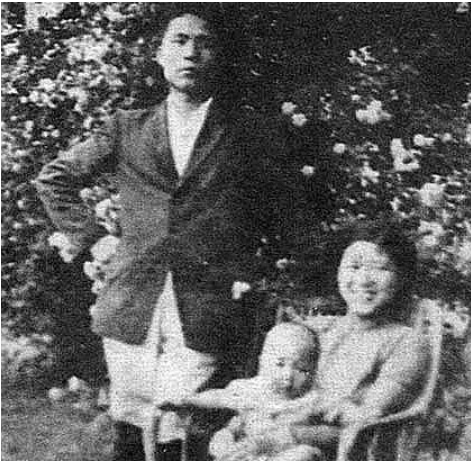
他退休后停止游牧了,搬出了作家宿舍楼,住进一处偏远的六楼顶层,每天只下来一次散散步。他退得比较彻底,多年来几乎再未踏进机关的大门。他不愿给别人添一点麻烦,好似在内蒙古作家群里蒸发了。直到有一天,我接到远方出版社社长陈莎莎打来的电话和随后寄来的书稿,我才知道这位老兄已改行扎入了历史的故纸堆中,而这叠厚厚的书稿,则正是他退休后多年来读史留下的随笔和札记。

翻阅着这部书稿,我被深深感动了,竟然夜不能寐,仿佛又被他那梦幻似的笔触带回到了七百年前那金戈铁马的草原往事之中。翔实的史料、精辟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客观的叙述,无不体现着这位老作家学识渊博、功力深厚、求真务实、探索不止的种种特点。或许是因为已经在内蒙古工作和生活超过半个世纪,茫茫的大草原已和他结下难解的情缘,故在退休后的蜗居生活中,他远离喧嚣一直在钻研和破译着这段历史。不求闻达,只恐对不住在内蒙古生活这大半辈子。后来多亏陈莎莎同志看到了他这批雪鳞鸿爪的读史随笔和札记,并发现他的这种探索或许也正是广大读者所急需了解的,比如:成吉思汗身后蒙古民族的走向;第一位人继华夏大统的蒙古族帝王又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这个由马背民族所缔造的大元王朝,又曾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的伟大祖国作出过何等历史性的贡献,而这一切又恰恰在冯苓植的读史随笔和札记中均有所展现。随之,在出版社的动员和支持下,又历经两年的努力,这部大作终于完成了。

■文史钩沉

捐赠琐忆

□金玉良



作家罗烽、白朗夫妇

将爸爸妈妈的一些文稿、书籍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早已商定好的事情,那里有罗烽、白朗文库。我知道把这些东西捐赠专门机构比存放在家里更稳妥,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真要拿走,还会有些不舍,心中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爸爸妈妈离开后,偶尔翻翻他们书写的文稿、日记或信件,摸摸、看看他们曾经用过的物件,几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亲人眼里却非同寻常。它不单单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它留有爸爸妈妈的余温,见证了他们生活、奋斗的波波波折。它是鲜活的,其中蕴涵太多的感情元素。

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件物品都有一段故事。不管这故事是愉快还是悲伤,都和爸爸妈妈息息相关。我从1978年爸爸和妈妈写给中央组织部“申诉材料”的附件中,挑出一份署名罗烽的“东北文艺思想指导上的两种偏向”的草稿给现代文学馆。这是爸爸1953年4月在“东北党的文艺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从书面上可以辨认是妈妈的字迹。文稿末尾有爸爸的标注:这个发言提纲是总结东北三年(1949—1953)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的个人看法,本文原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连‘造反派’红联军抄走,屡索不还。

回头看,也许就是这薄薄的几页文稿,竟改变了爸爸的后半生乃至妈妈的一切。

爸爸于1952年底,经本人再三申请由东北调全国作协归队搞创作。此前,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东北文化部副部长,兼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联合党总支(文联、广播电台、文化部)书记等。刘芝明是东北宣传部副部长兼东北文化部部长、东北文联主席。作为刘芝明的副手,爸爸分工抓行政工作,刘芝明负责思想领导。从1949年末到1952年底的三年间,爸爸和刘芝明在文艺思想上发生过一系列分歧,也有不少次争执。有的是在干部会议上,有的是在其他场合(如共同在李富春、李卓然面前)。分歧和争论的中心问题,有的似乎解决了,有的不了了之,有的则根本没调有解决。

1953年初爸爸曾完调京手续,拟到鞍山市弓长岭矿体验生活。途经沈阳时,应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要求并征得全国作家协会同意,临时留下帮助做大区撤销后东北文化界的善后工作,同时协助刚成立的东北作协主席团(由白朗、马加、草明组成)工作一时期。

在此之前,东北文联曾经接到全国文联即将召开全国文联扩大会的通知。东北文联要准备一个报告,题目是《三年来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与群众文艺活动问题》,报告于2月完成。经刘芝明审阅后即印发文联委员,拟召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首先肯定了1949年“东北代代会”刘芝明提出“创造新英雄人物”号召的正确,肯定了几年来成绩。爸爸看了这份铅印稿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东北作协的同志在讨论报告草稿时,也提出许多三年来对东北文艺工作领导的意见。后来李卓然召集会议,否定了这份报告。会上布置文艺业务部门,首

■我之见

大元王朝历史的艺术言说

□包明德

《大话元王朝》对我国各民族间互动交流的历史进行了艺术的言说。

大元王朝的缔造者当属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故冯苓植的笔触大都集中在这位中国历史上统一华夏的少数民族第一位皇帝身上。通过他那充满传奇而又命运多舛的经历,不仅回顾了成吉思汗之后历任大汗的功过得失,而且也展现了他如何继承伟大祖父“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宏伟气魄。是他第一个在草原上“纳儒习儒”,主动去汲取农耕文明相对先进的治国理念;是他率先使用各民族的能臣名将,合力结束了自残唐以来的藩镇割据战乱局面从而实现了祖国山河的大一统;是他建年号“中统”以示马背民族人继中华大统,成功地将一个游牧汗国转型为建都北京的大元王朝;是他广施雄才大略平云南、抚西藏,自秦、汉、晋、隋、唐、宋以来,首先奠定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疆域版图……故《大话元王朝》也可视之为大话忽必烈。通过他颇为复杂的一生,追溯我国各民族互动交流的源与流。因为,忽必烈的历史地位是值得彰显的,而大元王朝对华夏历史的贡献更值得大书特书。再看书中所提及的察必皇后,也绝非是一个文学中的杜撰形象。有大量的史料可为佐证,她的确是辅佐忽必烈“人继中华大统”的杰出蒙古族女政治家。中外多种史籍都有她“光彩照人,聪慧绝顶”的相关记述。《后妃传》中更称她“受命于天,佐夫终成帝业”。而她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更进而在对她的追谥册文中详述道:“曩事潜龙之邸,及乘虎变之秋,鄂渚班师,洞识时机之会;上都践祚,居多辅佐之谋。”他们都是草原汗国传统思维的改革派和创新者,已不满足于平原始的扩张攻掠方式,即在为臣下时,便于王府之内广纳儒生士人。他们大胆地汲取以儒家

先进行各单位的总结。并要求对领导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提意见。之后,以东北局宣传部的名义,于3月28日至4月10日召开“东北局党的文艺工作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一级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负责干部及东北各省、市文艺方面的领导干部共49人,因为会期在4月,故称“四月会议”。这期间,爸爸和刘芝明的思想分歧不但没解决,反而矛盾加剧。爸爸在会议发言中说:“我认为,三年来东北文艺是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但有较严重的缺点。就是:对文艺干部思想领导不够,普及工作缺乏系统,缺乏研究,这缺点有改变,但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巩固。”

“文革”中,李卓然谈到“四月会议”时说:“东北三年(文艺)工作有错误……当时有人说文艺创作是赶形势、赶任务,限三天四天就赶出一个节目配合任务就不能提高创作。我认为赶形势、赶任务结合实际没有错。好像刘芝明不大同意赶形势、赶任务。他是主张创作提高,赶形势、赶任务会限制提高。1953年的会,罗烽对刘芝明有意见。草明对刘芝明也不满意。”“做结论时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路线方向错误还是一般贯彻的错误,刘芝明当时好像偏向三年工作是正确的。我的意见是有严重错误,但方向错误要考虑。有人提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谁谁的记不得了。”

“现在看看,当时‘东北文代会’上对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一些口号是提出来了,但没有贯彻。”

1994年春,爸爸妈妈已先后作古。原辽宁作协主席方冰叔叔提到他们时说:“……罗烽同志讲群众路线,重视普及,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抓戏改,重视文工团,主张办汇演。1948年罗烽同志和我调查旅顺盐滩村的村剧团,支持寺儿沟街道剧团演出的三幕话剧《穷汉岭》,罗烽同志赞扬群众演得好。我认为大戏要搞,但把群众抛开就不好。罗烽和刘芝明的分歧就在这里。”

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倡“普及”还是“提高”,本是文艺思想上的问题。但是,爸爸妈妈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竟以“反刘芝明、反领导”为罪名,被打成“舒(韵)、罗(烽)、白(朗)反党小集团”。舒、罗、白三人不同意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一直在申诉。1957年“整风”之前,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党总支受党组委托召开有关同志的座谈会,处理1955年的“舒、罗、白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会上,前党组书记吕扬等五位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都说他们应该负有自己的责任,承认“那次会有简单粗暴的错误和缺点”,“不够实事求是,甚至刺激、损伤人的情况是存在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决定:“摘掉一切带有原则性的帽子,在原来那种形式的会议上当众宣布,并向沈阳作协(即东北作协)传达”。

正当爸爸妈妈翘首以待正式书面结论下达时,全国的“整风”形势风云突变。由最初的帮助党整顿作风,变为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斗争。随之,爸爸妈妈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他们成了“向党翻案”,为丁玲“献策”、“通天”的反党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贬谪塞外矿区劳动改造。

我曾与一位长者慨叹说:如果当年爸爸不去参加1953年的“四月会议”,就没有这个发言了。那么,就不会被打成反党集团,更不会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沦为阶下囚。老人笑我不懂政治,说我是善良人的善良幻想。他说“现实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特别身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即使没有‘四月会议’发言,还会有其他的什么发言”。

捐赠物品中,有一块长(62厘米)宽(27厘米)不大的三合木板,一边已破损。从1960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它伴随妈妈数十年,是妈妈的遗物。

妈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患慢性增殖性脊柱(胸椎、腰椎)炎。1958年下放阜新地毯厂织地毯,致使病情恶化,不能伏案写字。1960年后,虽然穿着特制的钢背心,也只能借助这块小木板放在沙发扶手上写作。

文化大革命,妈妈精神失常,继之,肺气肿、心脏病、胃切除五分之一。医院几次下病危报告。在妈妈卧床不起的最后三天,这块木板又成为她每日三餐的餐桌。一看到这块木板就能想起妈妈躺在床上的样子。十年,十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妈妈去世前,下肢变形、萎缩,因骨质疏松引发两根肋骨断裂,稍一动就锥心般地痛……

记忆,在无始无终的苍茫岁月中穿行。

■土地和生长

2010年夏末向柳青致意

□黄淑芬(中国台湾)

及蒙汉各民族历史人物之众多,涉及地理、宗教、建制、风俗等诸多门类学问之庞杂,非潜心研读诸史是难以下笔自如的。这就揭示出冯苓植“躲进小楼成一统”似乎销声匿迹的真相,原来他潜心苦研已快成为元史专家了。在旁观者看来,他原本可以再稍加努力,便可将这些随笔和札记进而汇总为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但他却始终声称《大话元王朝》顶多不过是一部“通俗史话”。他在电话中坦诚地告诉我说,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功力”不够,另一方面是他所追求的也正是通俗易懂。

虽然我深知冯苓植所追求的“通俗易懂”之良苦用心,但在通读全篇后我仍为冯苓植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折服。绝少主观的臆断,竟做到了每个历史人物均有籍可查,每个历史事件均有史可考。甚至就连书中引用的一些重要话语,均严格地注明了出处。更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在这部“通俗史话”中他仍延续了他那“不趋时、不媚俗”的一贯文风,绝少见为迎合时尚去拔高某个历史人物,而是严格地忠实于历史,客观地进行叙述。比如对待忽必烈,他就没有简单地将他写成一个别具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第一帝”,而是严格依据史实将他放置于二元文化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真实地展现了他复杂而又矛盾的心路历程;不仅记录了他对中华民族诸多的杰出贡献,而且也绝不回避他的失误、反复,甚至倒退;没有简单地直奔主题,而是强调了经过磨砺后的交融。这或许正是中国民族问题最鲜明的特色:各民族的

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精神文化的联系与互动,是中华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与标识。美国的莫里斯·罗沙比撰写了《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2008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如果说该著作是“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那么《大话元王朝》则是中国汉族同胞眼中的忽必烈大帝和他的帝国。一个是西方学者的论著,一个是中国作家的写史,二者可谓是相映成趣。这样的类比,我只是想再从一个侧面强调说明冯苓植的这部大作洋溢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着实可喜可贺。

但冯苓植却一再自谦没有那么“度量弘远”,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了却多年来的桩心愿愿:身为内蒙古人,当知蒙元史,但我们纵观他这些读史随笔和札记,方知冯苓植在退休后仍在“自讨苦吃”!须知,要梳理这段历史,所涉及古今中外史料之浩繁,涉

及蒙汉各民族历史人物之众多,涉及地理、宗教、建制、风俗等诸多门类学问之庞杂,非潜心研读诸史是难以下笔自如的。这就揭示出冯苓植“躲进小楼成一统”似乎销声匿迹的真相,原来他潜心苦研已快成为元史专家了。在旁观者看来,他原本可以再稍加努力,便可将这些随笔和札记进而汇总为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但他却始终声称《大话元王朝》顶多不过是一部“通俗史话”。他在电话中坦诚地告诉我说,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功力”不够,另一方面是他所追求的也正是通俗易懂。

虽然我深知冯苓植所追求的“通俗易懂”之良苦用心,但在通读全篇后我仍为冯苓植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折服。绝少主观的臆断,竟做到了每个历史人物均有籍可查,每个历史事件均有史可考。甚至就连书中引用的一些重要话语,均严格地注明了出处。更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在这部“通俗史话”中他仍延续了他那“不趋时、不媚俗”的一贯文风,绝少见为迎合时尚去拔高某个历史人物,而是严格地忠实于历史,客观地进行叙述。比如对待忽必烈,他就没有简单地将他写成一个别具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第一帝”,而是严格依据史实将他放置于二元文化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真实地展现了他复杂而又矛盾的心路历程;不仅记录了他对中华民族诸多的杰出贡献,而且也绝不回避他的失误、反复,甚至倒退;没有简单地直奔主题,而是强调了经过磨砺后的交融。这或许正是中国民族问题最鲜明的特色:各民族的

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精神文化的联系与互动,是中华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与标识。美国的莫里斯·罗沙比撰写了《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2008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如果说该著作是“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那么《大话元王朝》则是中国汉族同胞眼中的忽必烈大帝和他的帝国。一个是西方学者的论著,一个是中国作家的写史,二者可谓是相映成趣。这样的类比,我只是想再从一个侧面强调说明冯苓植的这部大作洋溢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着实可喜可贺。



乡村记忆(油画) 哥 陀 作

·第119期·

刊头题字:臧克家

红梅赞

——观电视剧《江姐》

□刘 虹

刚播两集,老虎凳还在剧情外休息
她还没有摘下妩媚的围巾
《红梅赞》还没有插上竹签
六十年后刺进我的心,却是谁
提前预约了我的泪水……
女人与革命,美的另一类
美得心碎。另类的旋律还没有找到
变奏的手,先要她
带血的指尖怒放红梅

却不知还能否打动今天的人类
七年前,我又一次到滦泽洞拜访
那些奉上头颅慷慨大爱的人
那些用热血浇灌信仰的人
那些歌唱着死去,又于一曲红梅中
欣然回眸的人。今夜再来,我顿感羞愧:
是否,我还没有资格谈论主义?又怎能
过于轻佻地说起牺牲,与爱情?

■土地和生长

2010年夏末向柳青致意

□黄淑芬(中国台湾)

接过“柳青研究会”副会长董颖夫先生特别准备的花束,依照董先生的指示,怀着虔敬的心,在柳青墓前,我献上一束花,也献上我最深的敬意。正如董先生说,来自台湾的研究者来向您(柳青)致意。

《大写的人》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组在1982年12月出版的一本柳青纪念集,在“出版说明”中提到,“高尔基曾把那些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称为‘大写字母的人’,用这句话来称誉柳青同志,他是受之无愧的”。这一次,在西安市长安区(以前的长安县),由民间集资筹建的“柳青纪念馆”里的纪念墙上,我又再一次地感受到长安人对这一位“大写的人”的深情。现年82岁的孟维刚老书记是特别受邀而来的老同志。当年柳青在皇甫村工作时,孟老是区委书记,是与柳青一同工作的革命同志;在“文革”初期,当柳青被拘禁在西安、关押在牛棚里时,孟老和一些村人多次暗中探视,设法改善柳青的处境;当柳青病重,却仍身陷牛棚时,他对孟老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想办法和皇甫村的乡亲们把我拉回皇甫,埋到神禾原上。”就是这一位陪伴柳青

■印 象

□高洪波

松涛不是山间的那一派莽苍的绿色音响,松涛是一个诗人的名字,松涛姓李,空军大校,军旅诗人,今年整六十岁,花甲之年回到故乡抚顺,抚顺为松涛建了一座三层小楼,名为“松涛文苑”,用当地宣传部长的一句话:这是抚顺的一座文化地标。

我们一行诗友,应松涛的召唤,聚集在煤都抚顺,来为抚顺的文化地标“松涛文苑”的落成剪彩、助威,这一天堪称是诗人的节日。记得十几年前在湖南湘西凤凰县拜谒沈从文先生故居,在一方巨石上有黄永玉题词,上书道“战士不是战死疆场,便是回到故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疆场和故乡,的确是战士的归宿。松涛是军人,他人伍时我退伍,他是空军我是陆军,我入伍时只是北京一个初中生,一列闷罐车七天八夜运到滇南重镇开远;松涛入伍已是著名青年诗人,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对他们均有提携指点,所以行前我赋一首小诗给松涛:

松涛一缕韵味清,曾借炊烟扬诗名。壮岁从戎不投笔,沧桑无倦入有情。

这首诗点出了松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成名作《第一缕炊烟》,也道出了他在九十年代初的长诗《无倦沧桑》,那个时期松涛由清新明丽的诗风转向沉郁苍劲,连写三首长诗,另两首一为《水浒一日游》,一为《拒绝末日》。三首长诗或大诗,让军旅诗人李松涛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变得那样深邃和与众不同,因此松涛成为我的偶像,我为研究“李松涛现象”曾下过一番苦功,也写过几篇感情充沛理性稍欠的评论文章,从那时到今天,也差不多过去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也是松涛把我们召唤到抚顺,出席首届“雷锋杯”的评奖,记得在北京到抚顺的火车上,我与李瑛、杨子敏、张同吾一干诗友同行。杨子敏还讲述了他战争年代的一次历险:一颗子弹曾卡在在他的胸膛上,那是一颗乏弹,力度不猛,否则就不会有人给我们在火车上讲这个故事了。子敏当时是《诗刊》的主编,七年后我鬼使神差地接替了他这个职务,上任初始,子敏便诚恳地跟我说:“洪波,你让我消失。”原来他有一系列庞大的创作计划,职务在肩而无法进行,现在终于解脱了,才使得杨子敏说出这样一席话来。

子敏已然远去,他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走的,安静得一如他的为人。但我记住了子敏的抚顺之旅,也记住了他讲述的一颗子弹的故事……

松涛文苑落成典礼异常热闹,这是抚顺开发区的高湾林场旧地,村名胡家沟。从松涛文苑望出去,是湛湛蓝蓝的高天,碧绿碧绿的青山,还有真正产生松涛的松林。屋后的小亭可让人歇足,亭外种的是东北人喜食的“苏子叶”,应是一味清心明目的中药,过年蒸黏豆包时必需的铺垫物,也是吃烤肉时上佳的裹食物,苏子叶类桑叶,有薄荷的清香,生食或腌制均好,在我看来这种植物类似西南的“折耳根”(鱼腥草),典型的地方食物。

文苑的草坪绿茵如毯,几方大石卧如狮虎,刻写着文字,这些石头的运输肯定是花了大工夫、大力气的,它们一旦入住松涛文苑,从此便成为文苑永恒的风景。我相信石头们很快活,石头与文人是天生的密友,证明这点的有不朽的《红楼梦》为证,它原名就叫《石头记》。

松涛文苑面积不太大,三百多平方米,但很雅。我尤其喜欢火炕、炕琴柜以及古老如文物般的烟管箩,这些物件让我想起自己北方的故乡、童年,还有抽旱烟袋的老奶奶;想起年夜饭、杀猪菜,以及一切欢乐的记忆。

松涛是个有心人,收藏家,不说别的,他居然收藏着三十几年间我寄给他的七十几封信件,包括夹在杂志间的便签。当松涛把这些信件展示给我看时,我感受到了一个老朋友浓浓的深情,惊诧中多了许多敬意——这也是诗坛文苑诸友的共识,对于大家,每个人都是松涛的挚友,所有应松涛的召唤来抚顺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因此松涛归乡的礼遇是大家的礼遇,松涛文苑落成的盛典是诗坛的盛典,松涛的快乐,自然是我们每个人的快乐。

诗人松涛回到故乡,响应的是抚顺市委市政府及父老乡亲的召唤,他从此成为抚顺的文化顾问,为六十岁之后的生活注入新的内涵。

我们来到抚顺,响应的是松涛的召唤,松涛之于抚顺,一如沈从文之于凤凰,相信从此之后抚顺的诗坛会让人刮目相看。

不过我懂憬的则是择一个雪期,盘腿坐在松涛文苑的火炕上,烫一壶老酒,吃两片血肠,跟松涛说:“味道没治了。”等待松涛再一次召唤。

慰地说:真不错,这里的人都知道有个柳青!在泥路小道旁下车,转入田间小径,再钻进一片苞谷田,沿着田埂,微躬着腰,出了田,然后一抬头,缀着红星的柳青墓就在眼前。在墓前放着两把长凳,几个纸杯,几位乡亲和孟老书记已经坐在那里喝茶了。微雨和,大家在柳青墓前说着话。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创业史》中高增福的儿子——才才娃原型者的一段讲演。现年已六十余岁的老农,诉说着往事,说着说着竟不由得泪流满面,他的陕西方言虽然阻碍了我去理解他所说的内容,却没有阻碍他所传达的感情,在雨中,我也流泪了。

别怀疑,台湾人也是可以了解《创业史》的。我对于《创业史》的喜爱首先是感性上的理解,对故乡亲人的喜爱在《创业史》中找到了呼应,因而产生了更进一步去研究这部小说、小说作者、小说所描写的那片土地、人民、社会的动力。也因为这股动力,加上各方助力,让我有机会亲自踏上柳青爱兹爱兹的这片土地,在神禾原上眺望“蛤蟆滩”,更因此能有机会会见因柳青而团聚在一起的人,感受到关中的浓厚人情味,以及当地人因乡土认同而凝聚成型的强韧本土情感。感谢《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的多方协助,让我们能有一个好的起点。

2010年8月20日,在西安的某家旅馆中,我把球鞋放在水龙头底下,用手轻轻刷洗着鞋底的黄土,这一层高密度的黏土在我手上留下了实质的存在感,而这一路之所见所闻、所受所感,正如同这层黄土,在我心中也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印象。